

埃及现代化道路的特点、问题及其反思

王林聪

在充满竞争的世界体系中,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和水平决定其在世界体系和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在现代世界体系中,“高速发展社会的经济—文化因素对低速发展社会具有强烈的传导性,自发的国际竞争机制又使这种传导性变成一种自觉的发展律令。”^①自近代以来,现代化已成为人类历史进程的主线,是各国发展的必然选择。埃及现代化探索历经200余年,从纵向来看,现代化实践已经深刻改变了埃及的历史进程并取得了突破性发展。然而,从横向国际比较来看,埃及现代化进展有限,尚未提升其国际竞争力,也未能摆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地位,甚至出现了“现代化困境”,这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反思。学术界对埃及现代化挫折及其成因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②对于破解现代化困境有着重要启发。那么如何看待埃及的现代化探索?为什么埃及现代化实践没有改变其边缘化地位?如何破解埃及的现代化困境?这些问题仍有待继续深入探讨。

一、埃及现代化进程的两个历史阶段

从历史发展来看,埃及因其与欧洲毗邻,是最早受到欧洲现代化冲击、最早效仿欧洲启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优势学科“当代中东发展”资助计划(项目编号:DF2023YS46)和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项目编号:21VXJ023)的阶段性成果。

-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 ② 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总结了埃及发展出现的三大问题:经济脱节、处于困境中的农业、社会不公的加剧,可参见萨米尔·阿明著,嵇飞译:《人民的春天:阿拉伯革命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49—159页。美国学者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强调所谓的“汲取性制度”的作用,认为“埃及贫困主要是因为狭隘精英进行统治,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组织社会而不惜牺牲广大人民的利益”,可参见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 罗宾逊著,李增刚译:《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中国学者纳忠、彭树智、杨灏城、于沛、王铁铮、杨光、毕健康、王泰、戴晓琦、车效梅、陈天社、余建华、朱泉钢、段九洲等从历史变迁、文明交往、发展道路、国家治理、政治稳定性、工业化、社会结构和阶层状况、政教关系和军政关系等角度剖析了埃及现代化实践诸问题。参见于沛:《近现代中国对埃及历史与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基于构建中国自主的世界史知识体系的思考》,《中国非洲学刊》2022年第3期。

动现代化进程的亚非拉国家之一。埃及现代化探索历经 200 余年,以 1952 年“七·二三革命”为分水岭,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依附型畸形的现代化。穆罕默德·阿里从军事现代化入手,试图建立近代工业体系以支持军备建设,变革传统的封建生产方式,一度形成了埃及近代史上短暂的“中兴”。在阿里改革过程中,新的生产方式逐渐出现,开始改变传统的经济形态。但是,欧洲殖民者自始至终反对阿里改革,他们觉察到阿里的军事现代化及其经济改革威胁了欧洲列强在埃及的殖民利益,于是联合起来扼杀了阿里改革。1837 年,受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委托,前去调查阿里经济改革的约翰·鲍林道出了欧洲列强的心声:“埃及永远成不了工业品制造国,或者说在相当长一时期内成不了工业品制造国。一个因其统治者无事生非而使欧洲列强总是感到担心的国家是不可能被允许存在下去的,但如果她能和平地发展自己的农业,还是会对大家都有利的。”^①最终,埃及被迫锁定于以棉花种植为主要产业的“以农立国”的畸形现代化之路。正如有学者指出:“埃及的棉花生产和出口,如同一面镜子,揭示了埃及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即最初(穆罕默德-阿里时代)主动种植、出口棉花以富国强兵,到 19 世纪后半叶过度发展棉花产业,从而使埃及经济走向单一化……埃及现代化由自上而下的自觉行为变为被动地卷入世界市场、经济单一化且过度依赖和受制于世界市场的畸形而缓慢的现代化进程。”^②

近代埃及当权者对外实行“不受保护的开放”^③(尤其是伊斯梅尔和陶菲克时期),盲目选择“全盘欧化”之路,彻底改变了埃及的发展道路。1882 年英国占领埃及,再次改写了埃及的历史发展进程——从奥斯曼帝国属地变为欧洲列强的半殖民地属地。实际上,贯穿整个 19 世纪,埃及是在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开启了畸形现代化之路的艰辛探索。^④埃及统治者对内垄断土地、财富和权力,对外依靠英国的支持和保护,造成国家的严重腐败、不平等和对外依附,这引起了埃及中小资产阶级的不满和普通民众的反抗。1952 年,在纳赛尔的带领下,借助广大民众的支持发动革命,推翻了传统封建统治,埃及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第二阶段是自主却又缺乏内生动力的现代化。1952 年埃及“七·二三革命”开启了埃及自主探索现代化的新纪元,在取得政治独立的前提下,启动了以争取经济自主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化过程。纳赛尔时期以政治变革推动社会和经济变革,以土地改革、国有化、工业化为主要内容,推动进口替代型经济现代化战略,力求摆脱西方的控制。然而,持续多年的阿以冲突和军事对抗环境改变了埃及的发展路径。由于大量资源用于备战,再加上长期的储

① 斯塔夫里亚诺斯著,迟越等译:《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220 页。

② 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2 页。

③ 王铁铮、闫伟:《中东国家现代化实践及历史反思》,《历史研究》2023 年第 2 期。

④ 王泰、任钰:《19 世纪埃及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互动》,《西亚非洲》2022 年第 1 期。

蓄和外贸“双缺口”,导致埃及经济发展缺乏足够活力和可持续性。1967年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惨败,宣告了纳赛尔时代以进口替代为导向的名为自主、实则封闭型现代化探索的失败。

萨达特当政后,试图纠正纳赛尔时期现代化探索的弊端,通过采取欧美模式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开放、出口导向和消费型经济改革。穆巴拉克执政时期,继续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推动现代化进程,2004年纳吉夫担任总理后又加快了私有化步伐。这一时期,埃及表面上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实际上,国家工业化整体水平不断倒退,国家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家垄断了国家权力和财富,广大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却不断被边缘化,社会不平等加剧,贫富分化日益严重。^① 2011年,埃及“一·二五革命”爆发,穆巴拉克总统在这场阿拉伯剧变的洪流中黯然下台,标志着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现代化探索再次遭遇挫折,埃及陷入了严重的发展困境。

塞西执政之后致力于纠正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弊端,提出“2030愿景”,试图以“新发展主义”模式开辟埃及现代化的新路径。新发展主义的核心指向是再工业化,以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改善项目为重点,全面实施以解决贫困问题为目标的“体面生活”倡议,重新矫正埃及现代化的航向,吸取历史教训,推进可持续发展和“再工业化”进程,探索真正的自主型现代化路径。

二、埃及现代化道路的特点

纵观200余年埃及现代化探索历程,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曲折性和畸形化。前者指埃及现代化实践经历了启动、失败、再启动等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后者则是指从军事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到工业现代化以及工业化“由实渐虚”^②的发展过程。其中,以农立国的现代化导致了单一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模式,而“由实渐虚”的工业化过程则偏离了现代化的核心,出现了依赖旅游、侨汇、运河收入、出口石油等“食租”型经济结构——当代版畸形发展模式,没有形成以工业化为动力机制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埃及现代化的目标并没有完成,仍处于艰难探索之中。

二是外源性和外部性。前者指埃及现代化探索缘起于国际竞争格局下仿效欧洲现代化的被动行为,是被迫卷入西方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沦为西方世界的商品供销地^③;后者则是指埃及现代化进程长期受控于外部力量——主要是欧洲殖民主义和西方大国,具有明显

^① Melani Cammett, Ishac Diwan, Alan Richards, John Waterbury,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 Westview Press, 2015, p. 4.

^② 陈勇、毕健康:《埃及经济转型、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92页。

^③ 王林聪、朱泉钢:《中国与埃及友好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

的外部性(externality)^①,即欧洲殖民列强和美国等西方大国等域外力量通过控制埃及的发展议程(包括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发展道路的选择等),不仅打乱了埃及原有的发展方式,而且主导着埃及的现代化实践,由此产生了更为严重的负面效应和依附性经济形态。于是,在外部势力的操控下,埃及难以主导自身发展,缺乏自主性。

三是失衡性和边缘化。前者指埃及现代化在改变传统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之后,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后者则指埃及的国际地位以及在既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持续边缘化。从历史发展来看,埃及现代化进程无疑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发展推动社会面貌有了明显改观。然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埃及的现代化成就并不突出,与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相比,其进展仍然有限。埃及没有以较有利的地位融入全球劳动分工体系,反而长期依靠低附加值的初级材料(棉花和油气的出口)、低技能和劳动密集型商品和服务的供应(侨汇和运河的收入),更难以形成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换言之,现代化实践不仅没有造就一个强盛的埃及,反而削弱其国际地位,埃及在全球经济竞争格局中呈现愈发边缘化的处境,^②从而形成了埃及的现代化困境。

由此产生的突出问题是:外源型现代化如何转变为内生型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强化自主性并改变其劣势地位。这是在既有世界体系中,后发国家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否则,现代化的目标就难以完成。

三、埃及现代化的问题和反思

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从根本上是要解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国际地位问题。现代化并不只是为了达到某些具体的现代化指标(不同时期现代化发展的指标是不断变化的),而是为了持续推进国家的发展,提升人民福祉。因此,从发展问题出发才能有效解决现代化困境。对于埃及来说,现代化的挫折恰恰说明没有解决持续发展的问题,既没有解决财富充分创造——即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也没有解决财富公平分配——实际上是生产关系调整问题,因而难以改变其国际地位和处境。埃及的现代化困境揭示了其背后复杂的内外原因,许多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因而是特殊国际环境的产物。

第一,埃及对经济结构的调整缓慢且艰难,始终没有解决现代化的动力问题。埃及的经济活力长期受制于扭曲的经济结构和机制,既没有发挥出计划经济的执行力强项,又没有彰

① “外部性”(externality)是经济学术语,指主体的经济活动对客体或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效应),按其损益情况可分为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和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将这一术语引入现代化研究领域,可以反映域外大国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施加的影响及产生的负效应。

② Amr Adly, “Introduction: A brief history of nation, state, and market,” Robert Springborg, ed., *Routledge Handbook on Contemporary Egypt*, Routledge, pp. 163 – 178.

显出市场经济的竞争力优势,^①降低了国家的财富创造和积累能力。

现代化的核心之一是工业化。工业化具有带动效应,能够从根本上推动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力地拓展就业基础,提高发展质量和提升国家竞争力。^②埃及现代化的第一阶段被迫以农业立国,谋求军事现代化;第二阶段从纳赛尔时期大力推动工业化进程,但萨达特执政后偏离了工业化方向,削弱了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而穆巴拉克时期更是出现了“去工业化”的势头,导致埃及形成了依赖于旅游、侨汇、运河收入、石油出口等行业的食租型经济结构,成为中东地区“大而无力、缺乏后劲”的经济体。实际上,通过对比埃及和土耳其的工业化进程及其成效,可以看出工业化对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土、埃两国虽然都经历了进口替代条件下的工业化、贸易自由化条件下的工业化,但是两国在最后一个阶段出现了巨大反差。土耳其实施更强有力的出口导向政策,利用欧盟市场扩大了制造业出口,并不断提升工业化能力;相反,埃及依赖石油资源出口,且经济发展的资源逐渐从制造业转移出去,不仅工业化水平不断下降,还出现了工业“由实渐虚”的重要变化。其结果是2010年,土耳其的人均收入水平比埃及高了150%,^③土耳其进入了G20国家行列,埃及则长期徘徊在中低收入国家之列。埃及经济结构问题长期难以改变,国民经济收入主要来源是石油等资源出口、苏伊士运河通行费、旅游和海外劳工侨汇,这极易受国际油价、国际及地区安全影响。埃及经济结构抗风险能力低,无法支撑经济可持续性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期,埃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明显高于中东北非地区、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国家。但到21世纪初,埃及已处于落后地位,国际地位日益边缘化。

更重要的是,埃及一直没有创造出一个有效率和有效力的市场,这是埃及现代化失败的重要原因。在纳赛尔时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快速推进了国家的工业化,但其封闭性发展路径造成市场效率低下,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缺乏竞争力。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虽然实行开放,实施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是并没有真正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市场机制,也未能激活市场活力。相反,参与市场的主体是既得利益集团和私营企业集团,并按照各自不同的规则运作管理,以获取金融、土地、技术、劳动力、信息和市场。于是,一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军队企业^④、国有企业、裙带企业得以享有大量资金、土地和政策

① 毕健康:《当代埃及国家治理、市场治理与发展问题研究》,《中东研究》2022年第2期,第219页。

② 杨光:《埃及的人口、失业与工业化》,《西亚非洲》2015年第6期,第124—138页。

③ Ulaş Karakoç, Şevket Pamuk and Laura Panza, “Industrialization in Egypt and Turkey, 1870 – 2010,” in Kevin Hjortshøj O’Rourke and Jeffrey Gale Williamson, eds., *The Spread of Modern Industry to the Periphery since 187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62.

④ 埃及前贸易部长拉希德·穆罕默德·拉希德表示,保守估计埃及军队经济规模至少有埃及国民经济的10%;卡耐基中东中心前研究员阿姆·哈姆扎维认为,埃及军队经济约占埃及国民经济的30%,规模约600亿美元。Daniel Kurtzer & Mary Svstrup, “Egypt’s Entrenched Military,” *National Interest*, no. 121 (Sept./Oct. 2012), pp. 40 – 50.

的特权,他们大量盈利,但吸纳的劳动力有限;而很多中小企业吸纳着绝大多数劳动力,却无法获得充足的资金等市场机会,因而这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潜力有限。由此导致埃及的食利经济、裙带经济盛行,无法为经济现代化发展提供有效的市场驱动机制。

第二,埃及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不足,阻碍了埃及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现代化既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又是破旧立新的不断变革过程,客观上要求当政者具有自上而下推动现代化的有效治理能力。然而,埃及现代化实践表明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现代化的推进,制约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甚至因治理失误,造成严重的“治理危机”。例如,萨达特执政时期,在与苏联断绝关系的同时,完全倒向了美国,事实上偏离了埃及长期追求的不结盟政策;一方面,通过与以色列媾和使埃及摆脱了战争的漩涡,另一方面却断绝了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陷入空前孤立,从而对埃及的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局面。政府治理能力不足还表现在处理一系列国内复杂的矛盾等方面,诸如传统与现代的对立问题,宗教与世俗力量、科普特人与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人口的快速增长与失业问题,过度城市化与严重的污染问题;贫富分化加剧和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的腐败问题等。

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埃及贫富分化和不平等加剧,40%的埃及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生活费不到两美元,失业率攀升,贫困化问题突出:各阶层占比情况为上层(顶层与中上层)为11%,中层为19%,下层(中下层加底层)为70%。^①尤其是中间阶层急剧萎缩和贫困化扩大,由此表明埃及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严重程度,从根本上损害了政权基础。政府治理能力不足,治理体系僵化,治理效能弱化,依赖于长期实行紧急状态法,强化对社会控制,反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民众反抗不断,形成多重复合型治理危机,最终演变为穆巴拉克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第三,外部力量的长期干扰,是埃及现代化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在埃及现代化进程中,域外力量和外部因素是影响埃及的重要变量。近代以来的埃及历史,就是一部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史。众所周知,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和干涉,打断了埃及的传统发展道路,破坏了埃及现代化自主探索的进程。20世纪后半期,埃及经受了地区长期动荡、阿以对抗和四次中东战争的“洗礼”,多次面临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威胁,正常的发展不断受到干扰和破坏。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的改革和开放,又频频受制于西方大国的控制和限制,损害了埃及现代化进程的健康发展。例如,为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获取贷款,埃及不得不按照西方的“要求”执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改革,然而这不仅没有帮助埃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严重限制了埃及的国家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债权人,成为埃及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进而导致“债务重负”笼罩于埃及

^① 毕健康、陈勇:《论当代埃及的社会结构与发展困境》,第17—18页;戴晓琦:《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以埃及为例》,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8—60页。

之上。萨拉·斯梅尔策通过研究 1991—2020 年埃及的商业—政府网络后指出,西方国家以“改革换贷款”的方式,迫使穆巴拉克政府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并形成了代表西方国家的埃及商业利益群体,严重影响了埃及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使得西方资本家和他们在埃及的商业盟友大量攫取埃及的经济改革成果。^①实际上,美国政府和西方国际金融机构不遗余力的威逼利诱穆巴拉克施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表面看是鼓励埃及通过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激发国家发展的活力,而背后的实质是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需要。由此表明,域外大国的经济控制乃是埃及现代化困境的根源。

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渗透干涉破坏了埃及对自身文化、制度和道路选择的信心,导致埃及难以提出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理念。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指出,埃及这艘大船正在没有任何指南针的情况下航行。它的船长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不想知道洋流正在把船带向何方。事实上,这艘船的航向完全取决于一个接一个出现的全球“行情”,对此埃及经济只得被迫日复一日进行“调整”,而这些调整所带来的则是各种各样的危险和不确定性。^②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大国除了通过政治和经济方式干涉埃及之外,还通过更加隐蔽的观念渗透方式影响埃及。例如,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理论,但其背后蕴藏着“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然而,埃及的知识精英却没有对此进行深刻反思,反而对西方国家亦步亦趋。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埃及在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引导下,沦为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试验品。这一试验并不成功,造成了埃及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失业率骤增,社会矛盾加剧,也使得曾经在中东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埃及深陷发展困境,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进一步边缘化。

结 语

纵观世界现代化进程,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如何突破西方主导下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通过现代化实践彻底摆脱其发展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当代世界的“现代化之问”。埃及现代化实践教训表明,开放不等于现代化,被动开放还是主动开放,依赖性开放还是自主性开放,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与失败。埃及经历了近代“不受保护的开放”——为西方资本大规模地渗入敞开了大门,使埃及落入了西方殖民主义设置的陷阱,^③丧失了经济主权和国家主权;1952 年以来,埃及从近乎封闭的经济模式转向开放型的经济模式,从集中力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转向积极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在开放和吸引外资方面饥不择食,以至

^① Sarah Smierciak, *Cronyism and Elite Capture in Egypt*, Routledge, 2022.

^② 萨米尔·阿明著,嵇飞译:《人民的春天:阿拉伯革命的未来》,第 151 页。

^③ 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45、166 页。

于外资多投资于消费型和服务型的项目,很少投资于生产型和外向型的项目,实际上不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萨达特时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消费性的开放”^①。穆巴拉克时期延续了消费型开放的“老路”,不仅削弱了经济自主发展能力、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而且走上了“去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最终陷入了严重的发展困境。

埃及现代化挫折表明,发展问题仍然是埃及现代化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现代化是复杂而艰巨的战略工程。“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②“在发展道路的探索上,照搬没有出路,模仿容易迷失,实践才出真知。”^③比较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西方现代化是一个——以资本为核心,以资本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强权政治为支撑,以牺牲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的——特殊的现代化道路。历史表明,埃及效仿西方现代化之路,从根本上来说是走不通的。埃及需要探索一个——以人为核心,以发展为动力,以人民福祉为目标的——新型现代化之路。当前,埃及正根据自己的国情、历史经验和教训、国际环境的变化等,重新矫正现代化的航向,确立新型现代化理念,即以新发展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再工业化进程,强化自主性开放和可持续发展,力求抓住数字化时代科技革命新契机,增强发展新动力,探索现代化新途径,提升埃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由此观之,新的发展理念和实践聚焦可持续发展问题,有助于破解现代化困境,推动埃及现代化探索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本文作者王林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 冉)

① 杨灏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82页。

② 习近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求是》2025年第1期,第9页。

③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72页。